

林甘泉 黄烈主编

郭沫若

与中国史学



郭沫若与中国史学

林甘泉 黄烈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 范明礼

责任校对: 宋 朋

封面设计: 鹿耀世

版式设计: 王丹丹

郭沫若与中国史学

GUOMORUO YU ZHONGGUO SHIXUE

林甘泉 黄 烈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编码100720 电话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印张 2插页 455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500册

I S B N 7-5004-1136-7/K · 166 定价: 13.3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从史学角度研究郭沫若的一部专著性纪念论集，分为上下编15个专题。主编林甘泉、黄烈都曾长期参与过郭沫若主持的史学研究项目，撰稿者大多也对郭沫若的史学活动有充分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全书系统、全面、生动地评述了郭沫若的史学思想发展历程和郭沫若在中国史学诸多领域的杰出贡献，为广大史学研究者 and 爱好者提供了一部内容丰富、生动具体、极有教益的学习参考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永久的纪念意义。

献 给
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

目 录

上 篇

一 才华卓著的一代史学宗师·····	(3)
开创中国史学的新天地·····	(4)
独领风骚的一批力著·····	(19)
“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35)
二 早期的史学思想及其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48)
泛神论思想支配下的古史观·····	(49)
对“公产制度”转向“私产制度”的认识·····	(54)
“偶像崇拜者”与“偶像破坏者”·····	(60)
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66)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问世 及其巨大影响·····	(72)
三 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83)
爱国主义思想与“士”的传统意识·····	(84)
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与文化发展取向 的认识·····	(95)
跳出“国学”的范围,才能认清“国学”的 真相·····	(106)
用“人民本位”的标准批判继承传统文化·····	(115)

四 西方文化的影响	(124)
从感情的喜爱到理性的追求	(126)
以西方模式作参照的早期史学	(136)
吸收西方科学的最新成果	(149)
用批判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	(161)
五 传统考据学的批判继承	(169)
传统考据学的发展和演变	(170)
在学术研究中运用考据学的方法和成果	(178)
对传统考据学的突破	(191)
六 治史的个性特色	(204)
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	(204)
不倦的自我追求与创新	(217)
以唯物史观为主的多重研究法	(226)
文史并茂和情智交融	(232)
七 史剧与史学关系的探索	(236)
十二个历史片断	(237)
史剧家必须得是史学家	(244)
历史科学需要艺术	(254)
争论还将继续	(265)

下 篇

八 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	(277)
“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	(277)
铁器与古史分期	(283)

殷周社会性质的判定·····	(293)
奴隶制的特点·····	(309)
两种社会制度的交替·····	(316)
战国秦汉封建论·····	(326)
九 历史人物研究 ·····	(340)
历史人物掠影·····	(340)
早年景仰王阳明·····	(348)
一生推崇屈原·····	(353)
关于秦始皇的评价·····	(359)
为曹操翻案·····	(366)
所谓“扬李抑杜”·····	(373)
十 农民战争史研究 ·····	(379)
热情赞颂陈胜、吴广式的起义·····	(379)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之作——	
《甲申三百年祭》·····	(384)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探讨农民战争的	
历史作用·····	(400)
十一 先秦诸子研究 ·····	(409)
先秦诸子研究概述·····	(410)
先秦诸子研究的特点·····	(432)
对学术界的影响和研究的不足·····	(448)
十二 甲骨文研究 ·····	(455)
甲骨文的搜集、整理与著录·····	(455)

甲骨学研究的多方面成就·····	(462)
甲骨文研究和商史研究的创造性结合·····	(485)
十三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499)
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历程·····	(499)
革新研究方法,建立断代体系·····	(505)
初步勾画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发展轮廓·····	(523)
金文资料所见的西周社会历史·····	(529)
各项专题研究·····	(535)
十四 先秦时代其他出土文献的研究·····	(542)
石鼓文·····	(542)
诅楚文·····	(549)
侯马盟书、楚帛书和行气铭·····	(552)
十五 成绩斐然的古籍整理·····	(556)
一生不忘整理古籍·····	(557)
通点、约注、笺释、今译·····	(568)
《管子集校》专论·····	(580)
整理古籍化入化出的功夫·····	(596)
后记·····	(601)

上 篇

一 才华卓著的一代史学宗师

1893年2月1日，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写的序言中指出：“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①恩格斯的这个精辟论断，对于我们评价那些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历史人物均有启发。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郭沫若就是这样一位大师。他经历了旧中国的死亡和新中国的诞生，他是中国旧史学的批判继承者，更是中国新史学的缔造者和弘扬者。从一定意义上说来，中国旧史学的终结和新史学的开端，也是以这位大师为标志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页。

开创中国史学的新天地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東西。”^①这是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应该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判断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贡献，自然也要根据他比他的前辈，即中国的封建主义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史学家所提供的“新的東西”。而这些“新的東西”，又只有通过如下的回溯和比较，才能鉴别和筛选出来。

众所周知，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更是具有治史传统的国家。在岁月峥嵘的古代，曾有过史家辈出，史著如林，执世界史坛之牛耳的黄金时期。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对此叹服不已：“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②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创始人梁启超也引以自豪：“中国在各种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③

诚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潜心治史的众多史家为后世留下了体裁多样、卷帙浩繁的史籍。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们治史的成果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历史科学。由于他们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④所左右，又加之他们短于理论思维，治史活动多囿于对菁芜混杂的史料进行搜集、校勘、考订、注释和编纂，量的积累多，质的飞跃少。即使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① 《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② 《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1页。

③ 《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6册。

④ 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也莫能外。以毕生精力“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的司马迁，虽然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编纂的先河，完成了“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②的传世巨著《史记》，叙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余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始末，重要历史人物活动，以及重要典章制度演变等，但却无法说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制约作用，更无力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不得不在唯心史观的迷宫中徘徊，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③，“天方令秦平海内”^④，嬴政称帝“盖得圣人威，河神授图”^⑤云云。

资产阶级史学的鼻祖梁启超，当他和他们隶属的阶级在政治上锐意进取的时候，曾经针对封建主义史学的弊端鼓动过“史界革命”，声称要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作理论武器“为史界辟一新天地”。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了“近世史家”即资产阶级史家有别于“前者史家”即封建主义史家的使命。他强调：“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

① 《汉书·司马迁传》。

② 郑樵：《通志·总序》。

③ 《史记·高祖本纪》。

④ 《史记·魏世家》。

⑤ 《史记·秦本纪》。

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①翌年，他在《新史学》中又阐述了资产阶级史学研究的目的是：“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②。梁启超在这里所说的“人群进化”，就是由“人间全体”所构成的社会之变动；所说的“公理公例”，则是这种变动的普遍法则。假如把梁启超的上述论断作一简要、完整的表述便是：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于从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中探求其变动的普遍法则。

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设想把中国“人群进化”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还指出了各阶段的起讫和特征：“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③

梁启超不以“一朝为一史”，打破王朝界限探索社会进化的设想，虽然没能准确地揭示出中国历史发展各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特征，更未能科学地抽象出历史的发展规律，但他毕竟把中国历史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考察，并将它划分为上世、中世、近世（或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来探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

③ 《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

求其从低级向高级的进化过程和因果关系了。这同扑朔迷离或治乱循环的封建时代史学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可是，随着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梁启超在史学领域里也偃旗息鼓，同封建主义史家“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同流合污了。1923年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副题为《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修补与修正》）一文中直言不讳：“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这句话，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①

在“史界革命”中进一步、退两步的梁启超，此时已不再倡导“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甚至对“说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的主张也发生了动摇，而将“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的谬说奉为主臬，大谈什么“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的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②。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梁启超并不能真正实现“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

中国史学真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最先把史学领域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致力于对唯物史观的阐释。他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对史学研究指导作用的理论著作。他在这部名著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

② 《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6册。

中，言简意赅地概括说：“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又称为经济的历史观。”“马克思述他的历史观，常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起，纵着看人间的变迁，便是历史；横着看人间的现在，便是社会。”“譬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与上层；社会的基址，便是经济的构造——即是经济关系——马克思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社会的上层，便是法制，政治，宗教，伦理，哲学，艺术等，马克思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基址有了变动，上层亦跟着变动，去适应他们的基址。从来的史学家，单欲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①同时强调，依据这个“根本理法”，“历史学在科学上得有相当的位置。治史学者，亦得有法则可循”^②。否则，史实纷纭，浩如烟海，治史者必将治丝益棼，茫无头绪。面对“现在还没有人用唯物史观的观点编出一部中国历史来”^③的缺憾，他又进一步向治史者呼吁：应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旧历史进行“改作和重作”，“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東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④。此处说的“普遍的理法”，显然是指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言。

① 《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9页。

② 《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32页。

③ 李星华：《青年的良师——回忆父亲李大钊在女子高师教学二三事》，载1979年5月14日《文汇报》。

④ 《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10页。